

馬克思主義  
與當代中國

周碧晴 著

中國國情  
與  
世界風云

遼寧教育出版社

# 马克思主义 与当代中国 丛书

贾非良 秦源培  
编

## 中国国情 与 世界风云

著

350457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丛书

贾非贤 余源培 主编

**中国国情与世界风云**

周碧晴 著

---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字数：140,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sup>7</sup>/<sub>8</sub>

印数：1—2,144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

责任编辑：陈 骏

责任校对：王淑芬

封面设计：安今生

---

ISBN 7-5382-1338-4/B·17

定价：3.05元

## 序

当历史车轮呼啸地冲撞着改革与现代化的热浪，滚进20世纪90年代时，一种更为紧迫的历史责任感重压在11亿中国人民的心头。回首过去，我们有过胜利的豪情，幸福的喜悦，也流过磨难和曲折的酸泪，还有触目惊心的“浩劫”之害、“动乱”之苦，……无论怎么说，本世纪的最后10年，都是中国人民背水一战、非拼搏不可的10年。——这是能否实现宏伟目标三步战略的关键10年；是能否通过改革创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新体制的关键10年；也是能否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并为未来世纪社会主义的大发展奠定根基的关键10年。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今后10年只是弹指一瞬，但它需要我们成就的事业是伟大、光荣而艰巨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醒我们，不管是干革命，还是搞建设，都必须从本国的特殊国情出发，这也是我们奋战10年的出发点。唯有搞清中国国情，我们才能把改革的重锤始终落在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地上，才能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方案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可行性和高效性，才能使全党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开创振兴中华的宏伟大业。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要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进行国情教育。

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小书，显然不是对中国国情和世界风云

的详尽介绍，只是意图从“魂”、“路”、“人”三个不同角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国情进行宏观的历史扫描，力求从客观事实与理论分析的结合上，揭示中国近现代社会演进嬗变的种种必然，说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必要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可能。

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我们不能局限于本地区或本部门的狭小视野，关起门来论短长，也不能跪在美利坚的“自由女神”像下，用“洋人”的目光来审察中国的是非。一定要站到时代的瞭望台上，把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民情等现状放到斩不断的历史长河中来衡量，通过纵向比较，弄清国情的来龙去脉，辨明社会发展的趋向；还要站在“中国的大道上”，把中国的现状放到世界风云的大背景中来斟酌，通过横向比较，找出水平差距，认准奋斗目标；更要在纵横比较的同时，对中国面临的若干现实问题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辩证思考：既要展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增强改革的紧迫感，又要讲明业绩的辉煌与任务的艰巨，确立历史的责任感；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要解放思想，反对固步自封和思想僵化；既要在国情分析中给人以客观、冷静和希望；又要从理论导向上给人以振奋、信心和力量；努力激发全体国民的远见卓识和创业精神。……如此构思，或许可取。但囿于作者的学识、经验和笔力，怕是难以如愿，只能作为一块“引玉”之“砖”，冒昧地抛向学林书海，静心地期待着反馈而来的斧正之声。

1990年3月

# 目 录

序	1
<b>第一章 “小小环球”上的中国魂</b>	1
一、龙文化溯源	2
二、地理格局与农耕文化	7
三、在融合中铸造	11
四、“东方一支”的独特风貌	19
1. 重视理想	21
2. 重视伦理	27
3. 重视群体	33
4. 重视统一	39
五、“马克思进文庙”	45
六、文化的裂变与修造	54
<b>第二章 “两声炮响”后的中国路</b>	63
一、“第四种社会形态”的萌生	64
二、在“瓜分世界”的刀刃下	72
三、“俄罗斯文明”的强烈感召	81
四、切莫再向“空想”返退	90
五、“在希望的田野上”	100
六、科技浪潮中的抉择	108
<b>第三章 世界潮流中的中国人</b>	121

---

一、国民性的历史观瞻 .....	122
1. 吃苦耐劳的愚公精神 .....	123
2. 自尊不屈的民族气节 .....	125
3. 精义入神的创造灵机 .....	127
4. 自律服从的趋同心理 .....	129
5. 不平则鸣的均等意识 .....	133
二、从“东亚病夫”到“醒来的巨人” .....	136
三、人才大军的期求 .....	143
四、“丧钟”还是“警钟” .....	151
五、民族创造力及其浪费 .....	166
六、试看“谁主沉浮” .....	177

## 第一章 “小小环球” 上的中国魂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鲁迅

要了解一国的国情，首先要了解该国的传统文化。因为，文化渗透在社会系统的诸要素之中，贯串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是任何民族、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灵魂。曾在古代世界掀起一片灿烂文明，且又在中华大地经久不息五千年的“龙文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值得炎黄子孙自豪的“中国魂”。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浪潮，势不可挡地荡涤着社会体制方面的种种弊端，而首先冲击的则是作为“国魂”或“民魂”的传统文化。于是，“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以及中西学的体用之争之类的探讨，日益成为人们大脑皮层的兴奋点，并以不同的方式，在孜孜不倦地思考着、议论着。现在看来，那种把现代中国的贫穷、落后简单地归咎于列祖列宗或者失望地自贬自责的“文化热”，确与中华振兴无益。需要的倒是一种冷静，即从传统文化的历史承传及其与世界文化潮流的融汇贯通这纵横两面进行慎重地剖析、透视，努力昭示中国魂的优劣处及其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联结点。如此思索，我们将不难发现，在中国的现代



化道路上，“儒学复兴”不可能，“全盘西化”行不通，唯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新文化的模铸，我们才能在传统文化的深厚地基上，构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化大厦。

## 一、龙文化溯源

“文化”一词，是个既普通又神秘的字眼。所谓普通，因它几乎涵盖了人类创造的所有财富，而且古今通用，无人不讲；说它神秘，则由于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伴有许多若真若伪、令人遐想的神话传说。在中国的古籍里，就曾记载着不少有关远古的神话和传说。如《韩非子·五蠹篇》，谈到过“有巢氏”时代“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和“燧人氏”时代“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情景。《易·系辞传》中有所谓“伏牺氏”时代“作结绳而为网罟，以细为渔”和“神农氏”时代“斲木为耜，楛木为耒”、“日中为市”的描述。《列子·汤问篇》中提到杂乱性交的“男女杂游，不媒不聘”。《白虎通·号篇》里载有母系氏族的“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这些记载，基本上是反映旧石器时期的人类终年累月栖栖皇皇地与大自然搏斗，昏昏愚愚地群居生活的场面。中国境内的西北、华北、东北、西南等地都曾有一时代人类生活遗迹的发现。由此可以肯定，在数十万甚至百万年前的中国境内，就已有人居住并在各个地区创造着自己的文化。

远古的神话传说固然不足为据，加以旧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比较贫乏，我们难以述说中国远古文化的详情。只有历史发展到新石器时代，中国古文化的序幕才缓缓拉启。近40年来，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遍布全国各地。据考古统计，目前已超过7000处之多，发掘地也在几百处以上。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曾经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考古学上命名为仰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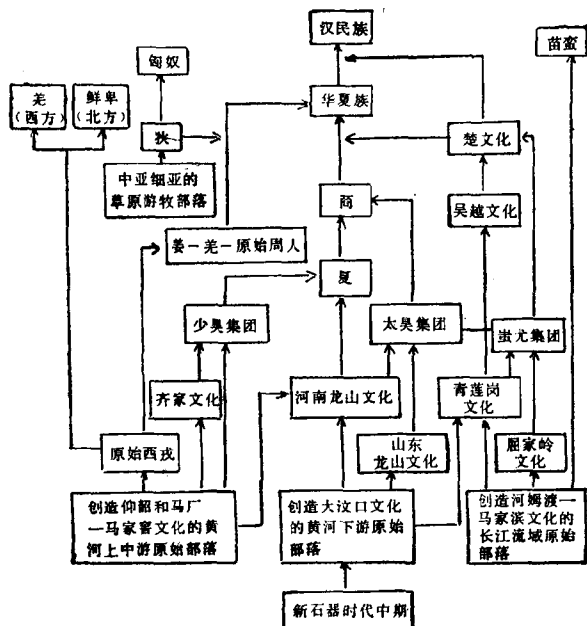
文化。仰韶文化散布在广大的西北地区以及华北、中原等地区。从陕西半坡遗址可见，这个原始村落中，存有小米、生产工具、陶器以及陶器上的具有原始文字意义的刻画与符号。它是中国古代文明发端的重要标志。在仰韶文化晚期的姜寨遗址中，发现大批墓葬。从其中随葬品的多少与种类，可见当时的人们已有了明显的贫富差别。据今约7000年的华东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仰韶的小米文化并非中国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的唯一代表，较河洛地区湿热的江浙地域也已孕育出不同于仰韶小米文化的稻米文化。由此可知中国古代文化的多源性。

约开始于公元前4500年或稍晚的大汶口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发端的又一标志。大汶口文化于1959年在山东宁阳堡头村西和泰安大汶口一带首先发现，它的遗址主要分布在山东，北及辽东半岛，南至苏北和安徽东北角。目前已经发掘的遗址有200多个，墓群2000多座。出土的文物表明当时除农业外，又产生了手工业及艺术，也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大汶口文化可分三期：早期属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中期属母系氏族公社后期；晚期属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代表是形成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1928年首先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故名。目前较一致的估计，龙山文化存在于公元前2000年到3000年之间，属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其遗址分布于山东和辽东半岛以及河南、河北、山西南部 and 陕西渭水流域。从发掘的遗址看，其生产工具与大汶口文化基本相同，经济生活以锄耕农业为主，同时又从事饲养、渔猎和采集。这时，氏族内部的贫富差别较仰韶文化更为鲜明。

大约在6000年前，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氏族部落，先后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这个曾被恩格斯称之为“激进的革命之一”的父权家长制的出现，是农耕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同时又为部落联盟的加速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在父系制时代，征战之风日盛。这种部落间的军事活动本身即是一种社会政治活动，它一方面使氏族血缘组织日益政治化，另一方面开创了部落统一的历史道路。作为中华民族主干的华夏族（汉族前身），正是在这种原始的军事活动中由多种原始部落相互融合的结果。据考证，融合成华夏族的古代部落集团主要有古夷人各部、古羌人各部、古戎狄一部、古蛮人一部、巴蜀先民和一部分古越人。其中，奉炎帝为宗神的古羌人大部和奉黄帝为始祖的古戎狄一部是比较强大的部落集团。历史上对三皇、五帝的说法虽然不一，并且不能排斥有些是后世的引申或增益，



古华夏民族起源示意图①

①录自何新：《诸神的起源》，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0页。

如皇、帝等称号显然为后世所加，但有一点可以理解，所谓三皇五帝多是部落首领或部落称号。它们所以被记载下来，是因为这些氏族部落的一部或全部通过较长时期的相互融合而产生了共同的文化，它们因而也就成了华夏族的共同祖先和华夏文化的开拓者。

古华夏民族起源的基本模式，也是华夏文化起源的基本模式，即从“中原核心”到“区域放射”，转向各地不同的文化特征。这些不同的文化彼此扩张、接触、交融，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形成了一个文化网络，从而奠定了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的原始基础。

众所周知，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当然称之为“龙文化”。中华儿女历来崇拜龙，在我国民间有不少关于龙的神话和传说。如哪吒闹海惊动龙宫、孙大圣龙宫借宝、柳毅龙宫传书等等，还有“二月二，龙抬头”之说。古书中讲，龙在“春分”登天，因此这天叫春龙节，北方大部分地区在这天早晨吃面条、油炸糕，比作为“挑龙头”、“吃龙胆”、以示吉庆。在我国封建时代，龙又成了帝王的象征，皇帝必须着龙袍，卧龙床，大凡帝王使用的东西往往都标有“龙”字称号或龙的图案。

据考证，对龙的如此崇拜，开始于我们远古先祖的图腾崇拜。在原始社会，龙就是华夏族的图腾。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关于龙的形状特征的详细描述。然而，世界上根本没有这种身体长、有鳞、有角、有脚、能走、能飞、能游泳、能兴云降雨的神奇动物。有一种早已绝迹的“恐龙”也完全不像这种民间传说中的龙，只是由于它是一个有脚有尾、令人惶恐的庞大的爬虫，考古专家们才称它为“恐龙”。既然根本没有龙，先民们又怎样勾划出龙的具体形象呢？很可能是因为形成华夏族的各个原始部落各以一种动物，如蛇、犬、牛、马、

虎、鹿、鹰等作为本氏族的图腾，后来，诸部落融合成华夏族后，就把各部落图腾的显著特征拼凑在一起，巧妙地编造出一个最勇猛强悍的动物。这种分析，虽有一定的猜测性，但从远古有关传说中，我们还是能够寻找到一些根据的。

据古代传说，居住在中国东方的人被统称为“夷族”。太皞是其中一族的著名酋长，神话里说他是人头蛇身，可能是以蛇为图腾的一族。居住在北方、西方的人被统称为“狄族”、“戎族”。其中“戎族”自称祖先为二白犬，想必是以犬为图腾。居住在南方的人被统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其首领蚩尤，兄弟81人，即81个氏族酋长。神话里说他们全是兽身人言，吃沙石，铜头铁额，耳上生毛硬如剑戟，头有角能触人。这一族大概是以一种勇悍善斗的猛兽为图腾。居住在中部地区的是炎帝族，炎帝姓姜，神话里说他牛头人身，大概是牛图腾的氏族。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与九黎族发生长期的部落间冲突。最后被迫逃避到涿鹿，得黄帝族援助，攻杀蚩尤。后来，炎黄两族在阪泉（据说在今河北怀来县）发生了三次大冲突，黄帝族统率以熊、罴、貔、貅、虎为图腾的各族打败炎帝族，黄帝族势力进入中部地区。黄帝姓姬，号轩辕，又号有熊氏。《国语·晋语》说，黄帝有子25人，其中14人共得12姓。所谓得姓，大概是子孙繁衍，建立起新的氏族。《山海经》、《大戴礼记》等书记载古帝世系，不论如何分歧难辨，溯源到黄帝却是一致的。历史上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相传都是黄帝的后裔。<sup>①</sup>从古至今，史学界都承认黄帝为华族始祖，再往前推，则有“炎黄”之称。

中华民族的后代常以“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自称。

<sup>①</sup>引自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册，第17页。

龙的奇特形象正是中华远古时代多部落兼并融汇、各民族图腾标志相互综合的产物。显然，中华远古文化并非什么外来货，而是在中华本土上由多种文化源头融合的，从多方社会根系派生的。龙文化的多源性决定了龙文化的丰富多采，也预示着它辉煌壮丽的未来。

## 二、地理格局与农耕文化

当论及人类社会的存在基础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sup>①</sup>任何历史记载当然属于文化，如同社会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自然基础一样，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依赖一定的自然基础。因为，文化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本身既是社会的产物，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最为重要的是，没有自然界，人们便不能进行赖以生存的物质生产，当然也不能进行文化创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文化形成的前提性因素。不同的地理环境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类型的文化。当然，文化类型的铸造主要是受各种社会条件，尤其是生产方式的左右。过分夸大地理环境在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取的，但地理环境毕竟是制约人类文化发展趋向的重要因素。而且，人类社会愈接近原始阶段，这种制约因素所占的比重就愈大。因此，当我们在考察祖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及其趋向时，不可忽略其赖以发端的自然基础，即地理环境的特点和作用。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24页。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其领土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地势西高东低，地形复杂多样。按海拔高度的明显变化，地势从西向东大致形成三级阶梯：西南部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是最高的一级；青藏高原以北，以东，下降到海拔大多为2000至1000米的高原和盆地，主要有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等，这是第二级阶梯；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以及云贵高原东缘一线以东，是海拔1000米以下的丘陵和200米以下的平原，主要有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东南沿海丘陵地带，这是第三级阶梯。其中山地占33%，高原占26%，丘陵占10%，盆地占19%，平原占12%。由于地势西高东低，河流多向东流入太平洋，主要江河有黑龙江、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长江中下游平原和青藏高原上有众多的湖泊，主要有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以及青海湖等。东边濒临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岸线长达18,000多公里。中国疆域辽阔，南北跨温、热两大气候带，大部分地区位于北温带和亚热带，虽然各地海拔高度、距海远近各不相同，气候差异较大，但总体说来属东亚季风气候。中国素有“地大物博”之称，矿产资源种类多、分布广、储量大；水产资源、水利资源也很丰富。与大海环绕的欧洲地理不同，中国东临茫茫沧海，西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巍巍山岭，是一个具有一定地理隔绝机制的泱泱大国。

据此，许多学者把中国称为“大陆国家”，而把欧洲称为“海洋国家”。这种称谓未必准确，但却大体上概括了中国与欧洲在自然条件方面的重大差别及其对民族文化的不同影响。对此，李中华先生在《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中作了颇有见地的如下概述：

第一，中国有极为广袤的疆土，其内部平原广阔，特别是黄河、长江两流域平原毗连，没有明显的天然屏障可以析划，

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上都较海洋诸岛易于统一，所以历史上强悍的游牧民族南侵，中国纵使丧失了首当其冲的黄河流域，仍有广大退路可供回旋。其它古文明地区沦亡于外族的入侵，即一蹶不振，独中国能对边族潜移默化，始终保持着自己文化的独特风格和完整系统，并使之绵延不绝。

第二，中国有较易于隔离的地理环境。这种一面临海，其它三面陆路交通极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境，遏阻了中国人的活动范围，使中国没有向外部世界拓展的野心，养成了独自经营、和平温顺的国民性格。所以中国文化大体上是在本土独自酝酿成长，虽偶有外来成分由西域或海上传入，皆能雍容消纳，使中国文化的发展稳定而富于自信。世界上有许多光辉的古文明都形成断层，只有中国的龙文化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也与此相关。

第三，中国的气候，也影响文明拓展的方向。古代巴比伦、埃及、罗马、印度等文明，都发源于暖温带而逐渐向寒冷地带发展，中国则相反。由于季风气候的影响，我国雨量由东南至西北递减，而地势由东南至西北逐渐增高，多数河流由西向东或由北向南注入大海。这种自然条件，往往决定收获的丰欠，再加上南暖北寒的气温，造成南长北短的农作物生长季节，这些条件对农民的垦殖发生吸引，所以形成人口南移、文化南进的趋势。

第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早在秦汉时期，就拥有6000万人口，而耕地面积却远远不足。再加上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这样不得不使农民在所分得的狭小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对土地作最经济的利用。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条件下，虽然忙碌辛苦，也仅能糊口，这便养成了安土重迁、乐天知命、安分守己的民族性格。对他们来说，土地就是生命，离开或失去土地就意味着贫困与死亡。这种经济上对土地的依赖，反映到民族



心理上则表现为对乡土的无限眷恋和对故国的深厚情怀。这种文化特色，形成中华民族最大的凝聚力。<sup>①</sup>

欧洲人一般用culture表示“文化”概念，这个词来自拉丁文的cultus，意为“耕作”。农业是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生产部门，凡是农业首先取得进步的地区，便是古代文化得以繁荣的地区。

中国独特的地理格局，构成了中国农业生产的优越条件，滋润着中国农耕文化的发展。从中国的古书籍中可见，中国社会的农业经济模式很早就形成了。殷墟卜辞中的“王其萑耦”、“王往萑耦”，表明了统治者对于农业的重视。而《诗经》中的“十千维耦”、“千耦其耘”则形象地展现了远古时代农业劳动的壮观场面。农耕文化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处在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在《孟子·告子上》中，我们看到齐鲁地区的农业种植可以达到一年两熟：“今文雝麦……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饶，雨露之养，人事不齐也。”《荀子·富国》篇中说，在荀子生活的时代，好的栽培家可以使作物“一岁而再获之”。张衡的《南都赋》则提到可以“稻下种麦”。与此同时，凿井灌溉、利用牛耕、制作农具也相当发达。

战国末年，就有文字详细记载了我国农业的耕作技术。公元6世纪北魏时的《齐民要术》，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系完整的农书。国外学者公认中国“早在公元6世纪就形成了即使从全世界范围看也是卓越的、杰出的、系统完整的耕作理论。”并且，在农耕与治国的关系上还有过许多论述，如“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sup>②</sup>；“仓廩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sup>③</sup>等，从而逐

<sup>①</sup> 见《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出版，第12~13页。

<sup>②</sup> 《商君书·农战》。

<sup>③</sup> 《韩非子·诡使》。